

反恐话语与伊战的本体论批判： 《尸体清洗者》中的反战书写

陈 豪

内容摘要：塞南·安图恩的小说《尸体清洗者》对战乱中的伊拉克人民投以本体论的关注，为伊战文学打开了新视角。小说批判了美国反恐话语的暴力本质，及对待外族的他者化标准。小说诠释了日常生活和艺术观念如何作为非暴力抵抗手段推进反战的理论和实践。死亡叙事由尸体清洗仪式延伸开去，表现了战争对存在本体的毁灭性打击，而死亡又以其辩证否定过程重新唤起主体的觉醒，解决了反战艺术的内在悖论，对由战争引起的“根本恶”的蔓延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

关键词：《尸体清洗者》；伊拉克战争；反战文学；反恐话语

作者简介：陈豪，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讲师，主要从事英美现当代文学研究。

Title: The Corpse Washer: An Ontological Critique of Counter-Terrorist Discourse and Iraq War

Abstract: Sinan Antoon's *The Corpse Washer* has an ontological concern over the misery of Iraqi people and initiat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Iraqi-war literature. It denounces violence and the trend of treating alien nations as the other in the U.S. counter-terrorist discourse. It also exemplifies how daily life and art advance anti-war theory and practice as a means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Beginning with the ritual of corpse washing, the death narrative exhibits the devastating effect of war on one's ontological entity. The dialectic negation of death gives rise to the awakening of subjective being and resolves the immanent paradox of anti-war art, which inhibits the dissemination of "radical evil".

Key words: *The Corpse Washer*; Iraqi War; anti-war literature; counter-terrorist discourse

Author: **Chen Hao**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His main research field is English and American modern literature. Email: textbook_5@126.com

作为后“9·11”文学的延续，以伊拉克战争为题材的创作正越来越受到美国文坛的关注。伊战文学继承了后“9·11”文学中创伤叙事的范式，只不过创伤主体从普通民众变为了参战军人。创作者们通过各种体裁书写士兵们在战场内外的经历，记录下他们的“勇敢与恐惧，求生与施暴间的狭窄界线，敌情的多变，内心的柔软，战友的情谊，自我的异化，往事的不堪回首，回家的无所适从”（Packer）。必须指出的是，作为国家暴力的实施者，美国士兵既是受害方，更是施害方。许多作品把关注焦点集中在士兵创伤的书写，等于掩盖了伊拉克人民才是战争最大受难群体的事实。如果对他们的声音不予以正视，伊战文学

将陷入作茧自缚的困境。

美籍伊拉克裔作家塞南·安图恩于2013年推出的小说《尸体清洗者》算是一个不小突破。小说讲述巴格达一个世代从事尸体清洗的什叶派家庭父子两代人的故事。儿子贾瓦德违抗父亲意愿，从小立志当艺术家，但经历了父亲故世、爱人离开等一系列打击，又加之战乱影响，迫于生计，重操家族旧业。他在绝望之余开始重新思考生命与艺术的本质所在。作品可贵之处在于它是少数从伊拉克人视角出发审视战争，并打入西方主流话语的小说。这当然得益于作者横跨两种文化的优势。而作品本身也破除了宗教民族的壁垒，着眼于人的普遍价值如何从暴力的肆虐中突围与救赎的探索上。

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战争，伊拉克战争一直“处于奇特的未完结阶段”（Luckhurst 721）。毫无疑问，今日其国内的乱局正是当时战争埋下的恶果。在全球化的今天，伊拉克危机已非地区性问题，前所未有的安全形势需要文艺以全新视角反思战争和人的关系。

《尸体清洗者》不仅关注战争之于平民的苦难，更着重反映他们在危机四伏中如何自主经营生活，从容面对死亡。新的主题为伊战文学另辟蹊径，把焦点从老兵的创伤转向战争新常态下平民抵制暴力的行动策略。这一转变将反战话语从政治领域引向人本位的思考立场，无疑促进了对暴力的彻底反思，而新的立场又在小说中孕育出日常、艺术与死亡这三重互为交织的维度，改观了反恐话语批判视角单一化的现状。

一、日常书写的反战维度

作为一部反战小说，《尸体清洗者》却把日常生活作为叙述的重点，这是因为来自日常的生命本体力量能用于破除战争的本体论范式。哲学上的本体论以“存在”为研究对象。存在乃万物第一因，即本原，任何以还原事物本原为宗旨的探索都是广义的本体论研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迄今为止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战争本体论经典。这部成书于19世纪的巨著将战争归结为政治的产物：“战争不仅是一种政策行为，还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依靠另一种手段继续”（119）。按克劳塞维茨的论调，战争既然同宣传、外交等手段一样，都只是国家间政治角力的工具，那么它就不应是“某种自主的东西”（121），不应僭越它所服务的目的。

克劳塞维茨的这一见解在今日依然大有市场。在对伊宣战的最后通牒中，小布什特别强调战争只针对萨达姆及其政权，并许诺伊平民会得到“食物及药品”援助，以及一个“繁荣自由”（Bush），没有政治迫害的新国家。然而，这个符合政治正确的作战目标不具备现实操作性。无论是覆盖全境的军事部署，还是萨达姆倒台后的权力真空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暴力泛滥。显然，战争的后续效应基本背离了当初设定的政治意图。阿伦特曾指出：“暴力工具的技术进步如今已经达到了如此地步，还没有一种政治目标能够配得上它的毁灭潜能，或者证明它在武装冲突的实际应用是正当的”（79）。现有科技水平极大提升了战争的暴力规模，一旦开始，发动者很难完全主导其进展。更重要的是，进行中的战争摆脱了工具属性，按照其自有逻辑——即把人类导向毁灭的模式逻辑——运行。“和所有行动一样，暴力实践改变了世界，而最有可能的变化就是变成了一个更加暴力的世界”（阿伦特 132）。随这种改变而发生的是战争与政治关系的根本反转，后者沦为前者的工具，并给予前者以合理性。如同“9·11”事件后，美国的安全、外交政策导向，例如“邪恶轴心国”的提出，实质是为输出暴力，或者说为开动战争机器服务。

随着战争的深入，政治的本体地位将由普遍性的毁灭所取代，这种转化与政治无关，

而与被战争扭曲了的人性有关。战争不仅带来毫无征兆的伤亡，还颠覆日常秩序，让身处其中的人深陷“朝不保夕”^①的动荡与恐惧中。在《脆危的生活》一书中，巴特勒指出，当直面生命“脆危”一刻时，人的内心深处会产生莫名的“杀人诱惑”（Butler, *Precarious Life* 136）。战争中，脆危意识占据主导，特殊人群例如士兵全面倒向暴力，因为他们惟有将自己完全异化为杀戮机器，才能存活下来。与之相对，平民站在群体暴力的对立面，还人之存在以日常的本来面目。海德格尔认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者是因为人的存在是一种“此在”（Dasein）。其结构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沉沦于“日常性”（everydayness）的“在世”（being-in-the-world）；二是向死而生的“本真”存在。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人物的职业设定将日常性与死亡捏合在一起。如此设计似乎呼应了“此在”的结构，从而引发人与战争二者的本体论概念在小说中激烈交锋。如果说战争强化了脆危意识，激发起人们为自保而诉诸暴力的本能，那么日常化遵循生老病死的生命规律，孵化出一种人之为人的内驱力，确保人类在险恶形势下仍遵守社会和伦理规范。

主人公的父亲天天同尸体打交道，对许多人而言，尸体是生命脆危性的标志物，然而在作者笔下，父亲的工作场所洋溢着抚慰人心的安详气氛。这是因为在一个与战场类似，容易触发大量负面情感的极端空间内，父亲仍能常态示人。例如，利用工作间隙品茶、看报、听广播；中午完工后，享用母亲带来的丰盛饭菜。贾瓦德首次观看父亲工作后不无惊讶地表示：“……每次父亲在洗完尸体后能轻易恢复生活的惯常节奏，这般的若无其事，似乎只是换个房间，就把死神抛在了脑后。死神随棺材离开，前往墓园，而一切又恢复生机”（Antoon, *The Corpse Washer* 22）。^②父亲的秘诀是从日复一日的家常琐碎中获取能量，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程式化的活动在日积月累中沉淀出生活本质。它们强有力地抵抗着突发变故或灾难引起的心理冲击，对家庭、邻里乃至社会关系的稳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贾瓦德长兄阿穆里之死是小说第一个重要转折点。这次意外对父亲打击沉重，但他并未因此心生暴力的念头。他只是在无助中呼唤神灵：“惟上帝拥有权力，惟上帝拥有权力，上帝之外无他物，惟上帝永存”（12）。祈祷是父亲每天必做之事，拯救他于无助状况之中的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说是生活习惯。重复性的日常活动让生活重返稳定状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死亡带来的无常感。父亲的话透露出类似斯宾诺莎自然神论的上帝观：上帝的绝对权力源自其所是（本真存在）与所在（在世）的绝对重合，上帝即是所有。在《论暴力》中，阿伦特认识到暴力与权力的对立：“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权力出现危机之处，暴力就出现了，如果任其发展，结局就是权力消失了”（115）。把父亲的上帝观同阿伦特的暴力观相联系，暴力意味着所是与所在的背离，施暴者往往为占据所在而丢掉所是。例如，美国攻占伊拉克的结果使得其恐怖主义受害国形象不再。同样地，恐怖分子通过制造袭击向他人宣示自己在场的同时也放弃了自己的人权。

对伊拉克人而言，战争苦难固然深重，但如何减少受难者不被暴力异化，避免所是与所在背离的本体论困境更是未来重建家园的关键。在此问题上，小说中以职业形象示人的父亲或许能给人启迪。无论遭遇丧子还是战乱，父亲都没有打破一贯的工作作息。这份坚持不是因为他具有非凡品格，也非信仰给予的深刻力量，而是作为日常主要活动的工作让他迅速摆脱了无助感，在一次次灾难来袭后重建生存意义。按照马克思的劳动本体论思想，人是“通过劳动和生产创造出自己的”（qtd. in Fromm 24），劳动也同时建立起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劳动能实现人主客属性的同一，换言之，人的所是与所在有望在其职业角色中重合。小说有处细节提到父亲从未用笔记本来记录工作程序：“所有笔记都在

他的头脑里，是经年累月记录下的”（24）。此处是主体与客体建立默契的明证。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长期实践形成的，意味着重复性的日常劳作使客观秩序得到维护的同时也把主体送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只要一进入工作状态，父亲仿佛被赋予了上帝般的存在感，能对他所处的空间实现绝对掌控，而一旦走出工作室，他又立即还原为千万如蝼蚁般活着的伊拉克人中的一个。作者对父亲人格的塑造交织着崇高与卑微的双重性，似乎意在暗示无论多么脆危的生命都拥有追求自由，实现自身价值的神圣权利。诚然，保持日常化的生活姿态无法直接改善现状，却不失为代价最小、意义非凡的反战举措。

二、艺术作为反恐话语的抵制手段

小说中关于艺术的讨论绝非闲笔，而是对反恐话语合理化的全面反抗。作者把艺术与人的本体论紧密结合在一起，阐述了艺术如何帮助脆危环境中的个体获得生存意义，并展示了伊拉克所取得的不输于其他文明的艺术成就。提出这些话题，作者是为了强调不同族群作为人存在的共性，以及不同文明彼此接纳的可行性，而矛头所指自然是反恐话语将伊拉克人他者化或妖魔化对待的倾向。

多年来，美国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正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据资料显示，反恐给了布什政府发动伊战的托辞，其真正动机是贯彻“新保守主义”智库提出的“新美国世纪计划”，该计划旨在“以武力和道德的明确性来推动美国的全球领导力”（Calabrese 158）。其出发点与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的论调一脉相承，都显示出一种对非西方文明二元对立式独断的独断。如今，反恐战争把当年亨廷顿假想的“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幻化为新闻报道里的“真实”图景（Huntington 22）。如果说战争将伊拉克搞得满目疮痍，那么为战争辩护的反恐话语则让世人深信那个暴力泛滥的国度确实处于现代文明的对立面。

在安图恩的随笔日记《一个罗马城的野蛮人》里，一位美国的艺术史学者质疑道：“伊拉克有现代艺术吗？”（Antoon, “A Barbarian in Rome” 32）话里透出这样的他者逻辑：挣扎于生存底线的伊拉克人不配拥有艺术。这里的谬误在于那位学者对艺术本体论的失察。在他眼里，艺术似乎是生存无忧后才出现的奢侈品，是物质生活的附庸和点缀。照此观点，艺术非但不能给生命带来启示，还将沦为区分生命贵贱的工具，而这也是反恐话语的基本立场。当反恐对象从某些组织扩展至整个国家时，难免伤及无辜平民，所以必须以默认不同地区人的生命有价差为前提。可悲的是，不少伊拉克人挺认同这种艺术观。小说中，主人公父亲极力反对儿子学习艺术；学校也极不重视艺术教育。当艺术之于一个民族可有可无时，它就自动放弃了一个与其他民族平等对话的机会。

对此，安图恩在小说中以一个伊拉克艺术家的身份发出回应。他给主人公设定的艺术家身份为叙事中插入艺术见解提供了方便。贾瓦德的艺术启蒙是在中学美术课上，授课教师雷德不仅树立了他从事艺术的人生目标，甚至影响了他的艺术观。雷德对艺术的本体论定义是“艺术与不朽紧密关联：是对死亡和时间的反抗，也是对生命的肯定”（31）。对一个正在被无视，被边缘化的民族来说，这个耳熟能详的见解是其救命稻草。艺术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表现的对象乃超越特定历史、社会环境的普遍人性，它确立了人类作为“类存在物”的相互平等。在物质文明远未丰饶的远古时代，人类便有了艺术实践的需要。这反映了人类渴望从中获得区别于物的存在属性，所以人类越处于存亡紧迫关头，越需要艺术给予的反省。而普遍人性常被社会-国家-阶级的意识框架遮蔽，本质意义上的人反倒成为马尔库塞所谓的“潜在他者”^③。

作为此类框架的副产品，反恐话语缩减了普遍人性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主体关系只限于框内。巴特勒指出：“没有条条框框就不存在生和死”（Butler, *Frames of War* 7）。因为离开框架的参照，框外人就拒绝从本体论上识别框内人的存在。即使在敌态度上，框架内外也有区别。在谈到美国对待欧洲和伊拉克的区别时，贾瓦德的叔叔一语道破天机：“美国没有像支持萨达姆那样支持过希特勒，它还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了德国”（86）。当然，极端势力设立的反社会框架把所有人包括自己都排除在普遍人性外，让伊拉克人的生存环境雪上加霜。

然而，种种意识的边框并非不能被破除，如果说媒体的作用在于固化它，那么艺术就起反作用。自由主义者们幻想的世界大同类似一种去社会化的乌托邦：“克服不宽容和暴力的唯一方法是从文化之中解救出主体的存在、它的普世本质：在它的核心之中，主体要变成零文化”（齐泽克 127）。但悖论是“零文化”建立在清算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上，这本身就带有独裁式的暴力意味。相较于政治思想家的激进，艺术家们显得低调许多。他们的工作需要同公共领域保持一定距离，但只要创作还原普遍人性，艺术至少能在不同社会框架间搭建沟通桥梁，最终取得彼此交融的效果。安图恩曾借雷德之口向读者介绍美索不达米亚的灿烂文明，指出伊拉克人早在远古时期便已思考艺术。雷德骄傲地宣称：“古文明的瑰宝滋养着我们的今天和未来，让伊拉克现代艺术的土壤变得肥沃，我们都是此文明的继承者”（31）。“我们”除了指伊拉克人，也指所有古文明的分享者和传播者，毕竟两河文明曾影响过埃及和希腊的文化艺术。自伊斯兰崛起后，西方和阿拉伯也从来不是两个封闭的文明框架，它们之间“不仅只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服，而且还有彼此交流、互利互惠以及分档共享”（萨义德 138）。这其中，艺术起到的催化作用有目共睹。因此，当贾瓦德在艺术学院看到被毁的文物时，作者所表达的是对全体人类文明遭受劫难的痛惜。

小说中，安图恩还提及毕加索给艺术下的一个定义：“艺术是再现真相的谎言”（40）。此定义是雷德观点的辩证升华，揭示了艺术与现实关系的二律背反。反映现实是艺术本职，而揭示生命本质更是其宗旨。当假象占据现实，普遍人性沦为“潜在他者”时，艺术就不得不走向现实的对立面，甚至以扭曲现实的方式重现真相。此处的二律背反为艺术解决双重他者（普遍人性的他者化引发人类群体间的相互他者化）的难题打开了思路。一方面，在暴力和谎言夹击的现实面前，伊拉克平民早已被宣告本体论的死亡。现在，无论政治、学术，还是媒体的努力都不足以开启重生，惟有艺术家另造世界，才能恢复其存在的原有属性。从这点看，艺术需要背离现实。另一方面，艺术又必须回归最平常的现实，因为普遍人性总潜藏在丰富的日常情境里。小说里遍布这样的情境，显示出在暴力与死亡夹缝里生活的人们依旧拥有儿女情长和对美好事物的感知力。

总之，伊拉克人亟待向世人展示的不是自己的宗教信仰，也非身上的阿拉伯属性，而是所有人都要回归的，最具普世性的日常生活和艺术天赋。但就反战艺术而言，仅聚焦这些主题是否会影响对战争残酷性的表现，从而削弱批判战争的力度？再则，贾瓦德和雷德的处境表明艺术家在伊拉克举步维艰，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又如何产生感染他人的艺术影响力呢？面对这些问题，安图恩的小说通过死亡叙事找到了答案。

三、死亡叙事：暴力批判的困境及解决

小说的死亡叙事对反战文学具有开拓意义。无论批判暴力，还是揭示人的本真存在，死亡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小说刻意避免正面描写战争，但读者依旧感同身受其毁灭力量，

这也要归功于死亡主题在叙事中不断再现的效果。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后记里，本雅明对战争的艺术化现象发出警告，他认为“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审美快感来体验”是“法西斯求助于美学的政治形势”（264）。如果法西斯的文艺旨在美化战争，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对其批判的文艺必须直面战争的暴虐以实现对美化的否定？一方面，这样做的危险是反过来激起受难者的攻击欲望。按弗洛伊德的看法，人的好斗本能受到文明抑制，但“对入侵者的敌视让发泄这种本能变得无可鄙夷”（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61）。正面呈现暴力可能只唤起的对敌人的仇恨，而非对战争的否定。可如果艺术对暴力视而不见，不触及核心又如何确保反思的深刻性？以上问题凸显了反战艺术面临的两难困境。回到本雅明的论点，他认为艺术品在复制传播过程中丧失了原作的“灵晕”。在笔者看来，“灵晕”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空间维度的呈现，无法通过复制来延续。我们可把反战艺术看成苦难摹本，其中的灵晕即受难者的真实体验，只有在相同环境下才能完整重现。当战争进入艺术文本被大量阅读或观赏时，它实质上已变成展览品，而苦难成了可供感伤的戏剧事件，不再是原先受难个体用生命写就，不可复制的体验了。显然，艺术在对苦难的表现中丢失了苦难的严肃性和神圣性。因此，反战艺术必须避开这一陷阱，以使自身成为那种人类苦难迫切需要的艺术，即阿多诺所谓的“一种不去粉饰苦难和减轻苦难的艺术”（转引自赵勇 187）。

对死亡双重性的挖掘帮助安图恩解决了反战艺术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死亡是暴力毁灭性的终极呈现，暴力以毁灭生命的方式达到毁灭权力的目的是其洗刷不掉的原罪。而海德格尔把本真存在建立在对死亡的畏惧上，其功能在于“唤起‘良知’，从而自觉地为‘自由’而进行‘决断’”（俞吾金 56）。显然，畏死心理是人类伦理意识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死亡又是日常生活中时有发生且无法回避的现象，印证了人的自在与共在并行的本体论结构。小说曾描述贾瓦德清洗过的一颗被恐怖分子割下的头颅。除遭斩首，受害者头颅右侧脸颊还有巨大伤痕，前额上有一处黑洞。当人的身体被如此对待时，遭践踏的岂止是受难个体，更是对共在状态下人与人相互依存性的否定。这表明暴力的恶区别于其他恶，它指向阿伦特所谓的“根本恶”，即“个体的人并未处于人的理由而杀死其他人，而是一次有组织的企图，企图根除‘人’的概念”（伯恩斯坦 262）。

在美国占领伊拉克不久后，贾瓦德不得不重操父亲旧业。激增的死者让他忙得应接不暇，噩梦连连：“尸体成倍增加，塞满整个清洗室，我只能出去溜达，街上也到处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堵塞了马路和人行道。开始的窒息感突然把我弄醒”（138）。这些噩梦当然不能全归咎于反恐战争。恐怖分子是制造“根本恶”的罪魁祸首。阿伦特提出形成根本恶的重要条件是“把人变成多余的人”（伯恩斯坦 253）。多余性的可怕之处不仅是剥夺人的主体性，更在于消除其工具性，彻底把人贬为毫无价值，可随时被消灭的对象。恐怖主义的本质是通过制造死亡来引发群体性恐惧，当死亡被用作工具，也就意味着存在仅在终止才具有意义。正如贾瓦德在对自杀袭击者的思考中指出的那样：“我知道人类所能达到的一种愤怒和绝望境地是觉得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都一文不值”（162）。而反恐战争的过错在于把“根本恶”引向失控边缘。小说描写了美军对平民的无端袭击，以及在巴格达设立安全区来隔离当地民众，种种行动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这里的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或者是巴特勒所谓的“不值得悲伤的生命”。他们“不会被人悼念，因为它从未在世上活过，或者说从未被算作生命过”（Butler, *Frames of War* 38）。如果战争双方都互视对方为“不值得悲伤的生命”，那么后果就是所有人都面临非人化危机。无论是恐怖活动还

是反恐战争，暴力发展的终点必然为双输。这或许是作者先用阿拉伯语写，再用英语重写小说的意义所在，反战对伊拉克人和美国人具有同等重要性。

在根本恶的黑洞里，死亡是为数不多连接人性彼岸的媒介。暴力结出死亡果实，但后者却反过来否定前者对人的物化。某人的死亡毕竟表明他曾作为生命存在的事实。当贾瓦德面对那颗头颅时，一系列问题几乎本能划过脑海：“他最后一刻在想什么？他能看见杀手吗？他是否被剥夺了这个权利？他能听见他们说些什么吗？他们为何或以什么名义对他斩首？”（156）这些提问背后的悖论是：当死者生前被押解为人质时，他只是恐怖分子手上的筹码，丧失了人的所有权利；而当只剩下头颅彻底变为物时，人们关心起他死前作为主体的感受。对人类而言，死亡是必然与普遍的叠加，构成人与人之间的终极关联。小说描述一位逊尼派出租车司机为安葬一具什叶派穆斯林的尸体四处奔波。两人此前还发生争论，但目睹死亡让生还者搁置了分歧。死神的降临只是时间问题，每一次有人死去都应是世者在世者敲响的末日警钟。因此，用于表现死亡的艺术不是供观赏的对象，而是通过接受者的想象烙印在灵魂深处的一种命运相连的关切。当贾瓦德重新考虑接替父亲工作时，他的动机是钱。而当站在尸体面前时，他的意志已不受理智支配，他与死者的关系超越了物质范畴。书中有许多贾瓦德梦境的插叙，其中多数都是梦见自己被恐怖分子绑架或遭炸弹袭击，甚至出现过一次自己死后躺在清洗台上清洗自己尸体的场面。以上梦境暗示主人公欲将自身主体意识投射到死者中以获得其死亡体验的潜意识，而潜意识影响意识的结果就是贾瓦德在他人的死亡中预见了自己的死。平心而论，这种共情谈不上高尚，却为防御多余性观念的蔓延构筑起最低限度的人性，以此为感性基础，才能形成对暴力的理性批判。

死亡的另一个辩证特性反映在推动脆危性向其对立面的转化，它进一步完善了自然人性对战争的抵制。脆危意识源于对死亡不期而至的恐惧，所以死亡是生命脆危性的顶点。不过，一旦到达顶点，先前的脆危迹象即刻消失，生活又重现日常面目。这是因为战争置人于超常规的经验里，而作为生命中的绝对必然，死亡是一切超常规和反常规的边界。尸体清洗的意义就是把死亡的这一反转外化为仪式加以保留。在贾瓦德的工作台上，所有尸体不论死于非命或寿终正寝，都只是本体陨灭后无差别的残留物。死亡让他们得到了本在情理中的人性对待，哪怕是那具头颅也被安置在木棺里下葬。清洗在宗教和世俗两个层面都具有净化的意义，净化反映了人性对原初的渴望，在本体论层面表现为对生老病死这些生活基本构成的关切。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弗洛伊德认为“死亡本能”的作用是驱使生命回到出身前状态，因为生物总是“趋向于恢复到先前形势”（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31）。它体现了生物怠于变化的惰性，而这种惰性又决定了它不接受任何激进的通往死亡的方式。表面看，“死亡本能”似乎勾起了贾瓦德对死后世界的向往。他曾在梦里向故去的父亲发问：“我们是活着还是死了？”（166）事实上，贾瓦德觉得自己虽生犹死，生命与死亡在其意识里发生倒置。战乱把现实变成地狱，他只有寄希望于死亡，甚至将此作为重生的途径。小说最后，宗教意识开始在主人公的死亡叙述中蔓延，但小说也提到他对宗教不热衷。他对天国的遐想与其说出于信仰，不如说是对重返秩序世界的期盼。面对杀戮机器，死亡或许是无助个体唯一可利用的抗争手段。它不仅是人性最后的庇护所，也是一面透视镜，照见暴力的荒谬。如果说政治话语为战争的合理性提供了背书，那么死亡叙事要做的就是毫不留情地把它打回罪恶的原形。

《尸体清洗者》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相：反恐战争与恐怖袭击有不少殊途同归之

处。反恐战争虽然“声称恢复秩序，事实上，它充满暴力。这种暴力超越了与他人的任何共处关系和任何对他人的理性认知”（内格里 23）。反恐话语与恐怖主义的对立主要体现在秩序的建构与破坏的政治意图上，而两者为达目的采取的减损生命的手段都显示出对生存本体的漠视。比起恐怖主义，反恐话语更危险的一点在于国家机器利用宣传优势更容易遮蔽真相。因此，超越国别民族视角，建立起抵抗主流反恐话语的声音平台成了伊战文学的职责所在，这是从安图恩的小说得来的启迪。

意义更为深远的是，人的“此在”书写，艺术本质的探讨与死亡叙事在小说中合流，形成站在本体论高度的反战话语。它抵制一切形式的杀戮，却不同于甘地式的非暴力抵抗。前者立足于本体论出发的伦理预设，而后者难掩其政治用意，它“抱着明确的仇恨观念，并对维护及加强反抗力量的重要性有明确的战略意识”（Caygill 11）。在甘地式的抵抗中，争取道德主动权不是出于消解敌意，而是为了在政治博弈中抢占先机。它或许能拆穿殖民者的伪善，却未必动摇得了原教旨恐怖分子的必死决心。显然，军事与政治的方式都没有触及问题本源。当前，“独狼式”袭击的频发表明恐怖主义活动正变得个人化和松散化，这一新趋势显示了安图恩小说的前瞻性，以及把本体论作为思考战争与反恐问题出发点的必要性。恐怖主义的症结还是源于自在与共生、个人与社区间关系的断裂，就是原子化社会导致的个体生存环境的恶化。要改善它，普通人能做的就是如小说所示，对构成存在要素的日常和死亡投以关切之情。前者在社区纽带的重建中发挥基石作用，让人们看到人类生活的相似性，从而拉近彼此距离；后者将人类连接为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他们危难时携手互助，甚至行利他之举的伦理基础。笔者相信，由两者孕育的生命观将为这个脆危时代里生活的人类避免自我毁灭构筑起最后的屏障。

注解【Notes】

- ①“朝不保夕”（precarity）以及下文出现的“脆危”（precariousness）都是巴特勒《脆危生活》一书提出的重要概念，两词的核心意义都指向一种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生命可能随时终结的处境。
- ②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 Sinan Antoon, *The Corpse Washer* (New Haven: Yale UP, 2013), 以下标出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 ③马尔库塞认为“欺骗与假象已成为被建构的现实的属性，遍布于历史记载中”，以至于生命的本质反而成为他者，出现在了艺术作品里（Marcuse 56）。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ntoon, Sinan. "A Barbarian in Rome." *We Are Iraqis*. Ed. Nadjie Al-Ali and Deborah Al-Najjar. Syracuse: Syracuse UP, 2013. 24-34.
- . *The Corpse Washer*. New Haven: Yale UP, 2013.
- 汉娜·阿伦特：《共和的危机》，郑辟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 [Arendt, Hannah. *Crisis of the Republic*. Trans. Zheng Piru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 瓦尔特·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 王斑译。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
-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Trans. Zhang Xudong and Wang Ba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2.]

理查德·J. 伯恩斯坦：《根本恶》，王钦 朱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

[Bernstein, Richard J. *Radical Evil: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Trans. Wang Qin and Zhu Kang. Nanjing: Yilin Press, 2015.]

Bush, George W. "Bush's Speech: A Transcript of George Bush's War Ultimatum Speech from the Cross Hall in the White House." *The Guardian*. 18 March 2003.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3/mar/18/usa-iraq>>.

Butler, Judith. *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London: Verso, 2009.

---.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London: Verso, 2004.

Calabrese, Andrew. "Casus Belli: U.S. Media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the Iraq War." *Television & New Media* 6.2(2005): 153-75.

Caygill, Howard. *On Resistance: A Philosophy of Defiance*. London: Bloomsbury, 2013.

卡尔·冯·克劳赛维茨：《战争论》，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Clausewitz, Carl Von. *On War*. Trans. Shi Yin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Freud, Sigmun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

---.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2.

Fromm, Erich. *Marx's Concept of Man*.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3 (1993): 22-49.

Luckhurst, Roger. "In War Times: Fictionalizing Iraq."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3.4 (Winter 2012): 713-37.

Marcuse, Herbert.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Trans. Erica Sherover.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安东尼奥·内格里：《超越帝国》，李琨 陆汉臻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Negri, Antonio. *Empire and Beyond*. Trans. Li Kun and Lu Hanzhen. Beijing: Peking UP, 2016.]

Packer, George. "Home Fires: How Soldiers Write Their Wars." *The New Yorker*. 7 April 2014.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14/04/07/home-fires-2>>.

爱德华·萨义德：《从奥斯陆到伊拉克路线图》，康建军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

[Said, Edward. *From Oslo to Iraq and the Road Map*. Trans. Kang Jianju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9.]

俞吾金：《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海德格尔、卢卡奇和马克思本体论思想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2001）：54—65。

[Yu Wujin. "Existence, Natural Existence and Social Existence —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ntological Concepts of Martin Heidegger, Gyorgy Lukacs and Karl Marx."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 (2001): 54-65.

赵勇：《艺术的二律背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命题的一种解读》，《外国文学评论》3（2015）：178—196。

[Zhao Yong. "The Antinomy of Art, or Theodor W. Adorno's Vibration: Trying to Understand 'To Write Poetry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3 (2015): 178-96.]

斯拉沃热·齐泽克：《暴力：六个侧面的反思》，蓝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

[Zizek, Slavoj.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Trans. Lan Jiang. Beijing: China Legal Press, 2012.]

责任编辑：刘兮颖